

古道百里 杨仙铺

陶 标

在寿县中南部、安丰塘南岸，一条贯通南北的千年古官道自寿州老城向南延伸，沿路串联井亭铺、安丰铺、十里碑、双门铺，一路行至城南百里地界，便是明清《寿州志》明文记载的杨仙铺。这条古道是旧时寿州通往六安 的南线要道，顺着淠水西河堤岸开辟而成，向北衔接安丰故城，也就是如今的安丰塘，向南通连牛角铺、谢埠铺，直通六安州边境，千百年来，都是南北商旅、官府信使往来的必经之路。

明清两代《寿州志》均有明确记载：“杨仙铺，城南一百里，额设铺司一名，铺兵一名。”古时交通邮传自有规制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设驿，百里置大型中转铺，杨仙铺便是寿城南线举足轻重的大铺。和地处安丰塘北侧的井亭铺不同，杨仙铺坐落于塘南一望无际的平畴沃土，地势开阔，水土丰美。街市依官道铺展，绵延两里有余，街道两侧店铺相连，陆路官道搭配淠河支流水运，水陆双便利的独特条件，早早催生出繁华热闹的古驿市集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这里便有民间通行小路往来百姓；至唐宋，官府大规模拓宽修整道路，正式划定为官方驿传大道；到明清两朝，全国邮传铺舍制度完

善定型，杨仙铺身兼三重功用：传递州县公文、供行路之人歇脚休整、集散南北各类货物。北来贩卖粮食的商贩，南下运送山货的茶商，奔赴六安赶考的读书人、往返两地办公的官吏，都要在此停留落脚。沿街林立的客棧、饭铺、杂货小摊，日复一日，撑起了古铺绵延百年的市井烟火。

“杨仙铺”这个地名并非随意取定，背后藏着一段在当地流传数百年的民间传说，完整道尽地名由来。古时候战乱频仍，官府四处强征青壮年入伍，本地一位杨姓青年为躲避兵役仓皇出逃。慌乱途中，他看见路边一间破败狭小的土地庙，便躲进庙中神像后方藏身。不多时，追捕壮丁的差役沿路搜查至庙门口，只见庙门结满蛛网，地上积着厚厚尘土，整座庙宇看不到半分人迹脚印，料定此处长久无人到访，便转头向别处搜寻。待官兵走远，杨姓青年才从神像后走出，心中笃定是庙中土地仙翁暗中庇佑，才让自己躲过一劫。他对着土地神像郑重许下誓言：倘若日后能够安稳度日，积攒家业，必定重修庙宇，重塑神像金身。多年之后，杨公外出经商，家业渐丰，始终牢记当年许下的承诺，回到家乡后，在驿铺西南选址，大兴土木修

建了一座三进三出的杨仙庙，专门供奉土地公婆。当地百姓都亲切称庙内土地公为大胡子仙翁。

因修庙之人姓杨，庙宇又护佑一方乡民平安顺遂，百姓便称这座庙宇为杨仙庙，官道旁的驿铺也随之得名杨仙铺，名称代代沿用，流传至今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，杨仙铺都会举办盛大庙会，周边双门、众兴集、隐贤集的乡民十里奔赴，前来烧香祈福。庙外戏台连日搭台唱戏，沿街摊位连绵不断，人声喧闹、车马往来，是旧时寿县南部规模数一数二的乡土盛会。

古铺紧挨着淠水西河大堤，河堤与官道并肩延伸，既是守护两岸田地村落的防洪屏障，也是行人往来的便道。堤下建有杨仙古闸，沟渠水系通安丰塘芍陂灌溉网络，水利农桑与交通驿道在此相融共生。依托古道兴盛起来的杨仙铺，是当年寿州南乡规模较大的集市。每逢赶集、庙会，方圆数十里百姓齐聚官道两旁，粮油牲畜、农耕农具、香火杂货摆满整条长街。街头小吃独具风味，现炸油条、清甜米糕、嫩滑豆腐脑，是赶路行人必尝的乡土滋味；街道中段连片分布杂货铺、麻油坊、蓝印花布染坊。六安大山里产出的竹木、茶叶顺道运至此

处，寿州城里运来的布匹、食盐在此中转分销，南北物资互通有无，一派繁荣景象。

岁月流转，当年沿街的车马客棧、传统老作坊早已消逝在时光里，可“杨仙”这个地名始终不曾更改。如今这里是安丰镇杨仙社区，平整宽阔的乡村公路四通八达，成片高标准农田一望无垠，安丰塘流淌千年的水系依旧滋养着这片沃土。昔日连通寿州与六安 的百里古官道，如今拓宽改造为平整的县乡主干道，在此与连接安丰、隐贤的 324 省道交汇，交通便捷远胜从前。汽车货车取代了古时的骡马挑夫，崭新的乡村集市延续着祖辈传下的热闹烟火。

行走在今日的杨仙街间，脚下泥土之下，深埋着千年驿道碾出的深深车辙；乡间邻里闲谈之间，依旧传颂着杨公避难、土地仙翁庇佑乡民的古老故事。一条沧桑古道，一座承载民心的仙庙，一处热闹百年的市井，地名传说、古代邮传、水乡农耕烟火在此融为一体。杨仙铺不只是古籍方志里一笔简单记载的驿铺地名，更是寿州南部古官道文明的鲜活缩影，藏着芍陂之畔百姓代代相传的行路往事，与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温情。

考烈王的盛宴(四)：封庖启味

萧 阳

如今的淮南人喜食汤锅，咸鲜辣的味道咕嘟咕嘟慢火炖进了汤里。从武王墩的大鼎到淮南街头的牛肉汤锅，两千多年的光阴味道，仿佛也被炉火熬成了浓郁的甘香。

今天的人们一定很好奇，考烈王的饕餮盛宴上，会用到什么调料，又是什么味道呢？

武王墩墓的东一室像极了考烈王封存千年的“厨房和餐厅”。出土的一百五十余件青铜器，涵盖鼎、簋、簠、敦、钫、壶、甗等各类宴飨与祭祀器具，还有百余件漆木质饮食宴享用具，为研究楚国宫廷烹饪技艺提供了直接物证。

猪、牛、羊“三牲”，狗、獐、梅花鹿等“野味”，青鱼、鲇鱼等水产，葫芦、栗子、梅子、生姜、花椒等果蔬与香料……这些琳琅满目的食材在大鼎中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变成楚国大厨精心烹制的“硬菜”。

大量梅子与肉食搭配，很可能是用来调味去腥的。梅子富含果酸，口感酸甜，可用作汤羹的调味品；又富含清香，利于消减肉内的腥膻之气。早在殷商时期，古人便将梅子捣碎成浆汁，称作“醢”，用以去腥增鲜。楚人深谙此道，梅子用来去腥添酸爽，让醇厚肉味多了一缕清亮的回甘。

武王墩中生姜的出现并不意外。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，《穆天子传》中记载，“桂姜”作为名贵香料，与黄金、贝带一起被周穆王赏赐给部落首领。《论语》也有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的记述，足见生姜早已进入华夏先民的日常食谱。

楚地卑湿，生姜不仅去腥增香，还能驱寒除湿，契合楚人的饮食习惯与养生之需。生姜与鼎内的雉鸡、黄牛等肉类一同经历了高温烹煮，辛辣去腥、增香提味，是两千年前楚官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

花椒除了祛湿气，在墓葬中还有防腐驱虫的功效。彼时中华民族的餐桌上还没有辣椒，辣椒的传入是一千多年以后明朝的事了。楚人用生姜和花椒来营造辛香风味，用梅子增添酸爽，再加上盐等调味品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“五味调和”体系，《楚辞·招魂》“大苦咸酸，辛甘行些”的诗句有了生动注脚。

与花椒一同出土的香料作物还有锦葵。这种植物的花朵富含挥发性的芳香物质，今天的人们还用它来制作香茶。锦葵在武王墩墓中可能是以花果入

药或以种子熏香，堪称考烈王香料谱中的点睛之笔。

武王墩的青铜器不仅提供了上述食材线索，还揭示了楚国的烹饪方式。先秦时期，鼎一般用作烹煮器，簋、簠、敦等则属于盛放器。鼎中发现的炖牛排、栗子烧肉、葫芦雉鸡等荤素搭配、调味恰当的精致菜肴，反映了楚国宫廷饮食的考究。

文献记载，楚人采用炮、煎、羹、蒸、卤、醢等十余种烹饪手法。其中，“炮羔”的做法与西周“八珍”中的“炮豚”相似。将羔羊裹以泥巴煨烤，再经炸、炖等多道工序，工序繁复，火候极难把控，需要庖人高超的烹饪技艺。

“蒸”则是楚人另一项引以为傲的烹饪技艺。武王墩墓中出土了五件青铜甗，数量之多在战国同时期墓葬中极为罕见。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蒸锅，下部为鬲或鼎用以烧水，上部为甗底有算孔，水沸时蒸汽升腾，将食物煮熟，与今天的蒸锅几近相同。

在武王墩食物遗存中，还发现了《周礼》“八珍”之首“淳熬”和“淳母”的蛛丝马迹。古人将煎煮过的“醢”(读音hǎi，即用牛、羊、雁、鱼等发酵制成的肉酱)，浇盖在稻米或黍米蒸饭上，分别称作“淳熬”和“淳母”。有时还要浇上一勺动物油脂，让肉酱的咸鲜与油脂的醇厚都深深渗入米粒中。武王墩中食材俱备，当年考烈王的厨房中很可能制作过这种传说中的高档珍馐。

楚人还将蒸与炖结合使用：鼎中炖煮的牛排、栗子烧肉，是长时间慢火煨制的成果；青铜甗中的蒸食，则利用水蒸气迅速熟化食物。一炖一蒸，一慢一快，体现了楚人对火候的精准把握。

楚人还讲究原料的选择，以楚地所产的新鲜水产、禽鸟、山珍野味为主，烹调过程中重视刀工和食材搭配。

从武王墩墓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，考烈王的餐桌上不仅有牛、猪、羊、狗等家畜，还有獐、梅花鹿等野味，以及鸭、雉、青鱼、鲇鱼等多种禽鱼。在部分鼎中，黄牛肋骨与鱼类混合炖煮，荤素相济，鲜香互渗，这样大胆的配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创意。

看着这些千年前的各色食材和香料，仿佛能闻到那穿越时空的味道——那是鼎中炖煮的内香，是甗中蒸腾的饭香，是梅子的果酸，是姜椒的辛麻，它们共同书写了一部青铜之上的楚国烹饪史。

从“精妙绝伦”铜尊 透视州来古国

周 强 杨 倩

《史记·淮南列传》 第一季

“春秋三足羊首铜尊”是国家一级文物，也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之一。常远霞女士在《馆藏春秋州来故地出土文物观感随笔》(《收藏家》2022 年第 9 期) 中评价说，这是一件“精美绝伦的藏品”。成语“精妙绝伦”源出于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·灯品》：“灯只至多。苏、福为冠，新安晚出，精妙绝伦”，以“精妙绝伦”来形容宋代新安地区(即徽州地区)的花灯工艺超越了苏州和福州。“精妙绝伦”诞生之后，后世人们用着用着就改成了“精美绝伦”，现在两者都是常用成语，都用来表达精致巧妙(或美丽)、无与伦比的意义。

1975 年，在寿县正阳关镇肖岗湖堤坝修筑工程出土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座春秋土坑墓，出土了鼎、簋、尊、缶、盒等一批器物，其中的 7 件青铜器入藏寿县博物馆，现为楚文化博物馆的馆藏文物。

这组器物大多素面光洁，其中伴随有少量装饰简洁流畅的回纹、云纹，器形精巧玲珑，线条流畅，极富美感，“展示了淮河流域土著先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……其浓郁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，反映了本地在未受楚、吴影响前的文化面貌。它们不仅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，更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”。引文中，州来国“未受楚、吴影响前”的时间应该是在春秋早期，甚至可以提前到西周晚期。

三足羊首铜尊“器身高 11 厘米，通长 14 厘米，口径 9.2 厘米，整体造型像一只圆润小巧、灵动古朴的温顺绵羊；器身油亮光滑，直口，圆腹，腹身的一侧向外凸出延伸至口沿上方，呈绵羊首状，绵羊面部耳、目、鼻、嘴及羊角以阳刻线条描摹，器底置有三个上翘钩状器足；扁平的器盖，正中同有一个桥形半圆钮，一端有弧形缺口，用以直接卡入羊颈，另一端呈扇形下斜象形羊尾，其上装饰有勾连云雷纹；整件器物小巧玲珑，造型独特，形态生动，在同时期出土



大地指纹

左先法摄

北宋首任忠正军节度使杨承信的“处变”定力

孙友虎

建隆元年(960年)五月十七日，因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来朝觐见，宋太祖赵匡胤特意“宴近臣于广政殿”，以示隆恩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一句“自是节度使来朝，即宴如例”的注解，以“首例”的款待，显示非常之举。

宋朝初立，藩镇割据的状况仍令人揪心。觐见者有觐见的顾虑，设宴者有设宴的指向。杨承信此时一身兼两职，“忠正军节度使”是承袭三年前后周周世宗柴荣的任命文本，“侍中”是赵匡胤“陈桥兵变”、黄袍加身之后予以的特别赏赐。

杨承信或许没有想到，他前脚离开忠正军的营地，便是永远的告别。

忠正军的驻地，在淮河中游的下蔡(今安徽凤台县)，聆听着王朝更替的哗哗流淌。《北宋经抚年表》给“忠正军节度使”的定位是：“忠正节度使、管内观察使、寿州刺史、领寿、濠、泗州。”

后周是唐末割据、“五代十国”大背景下的一个站点。

一介淮水拦不住“五代十国”的流向，“兵子”当“天子”司空见惯。

早在唐天祐四年(907年)四月十八日，受唐赐名朱全忠的朱温，率先举起反唐的大旗，建立大梁，史称“后梁”。后梁龙德三年(923年)四月二十五日，晋王李存勖在击败契丹军、平定河北的情况下，即帝位于魏州，国号大唐，史称“后唐”。后唐自明宗死后，内乱迭起。明宗女婿、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被改任天平节度使，不服从调遣，起兵自立，并寻求契丹的外援，于清泰三年(936年)十一月十二日，建立大晋，史称“后晋”。这种朝代的快速更替，撕裂着山河，甚至影响着家庭的伦理与秩序的重塑，杨承信的家族也自不例外。

杨承信，字守真，其先沙陀部人。他的父亲叫杨光远，身处乱世，曾发生两次“背叛”的境况。第一次，作为后唐的

副使，关键时候叛变后唐，投降后晋高祖石敬瑭，官至太师、寿王。第二次，因不满后晋对契丹的政策之变，在青州起兵叛乱，投向契丹。

后晋少帝石重贵派遣李守贞讨伐他。在危机关头，杨光远被他的大儿子杨承勋劫持，投降后晋朝廷，结果父子俩落个先后被杀的下场：杨光远被后晋杀，杨承勋被契丹杀。

杨承信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七年(921年)，是杨光远的第三子，“幼以父任”，官至武军节院使。后晋少帝时，“领兰州刺史，为政不苛”，“历宣武、平卢二军牙校”。开运元年(944年)十一月，父亲杨光远背叛后晋被杀，他和弟弟杨承祚一起赴京都“请死”，以明心志。闰十二月，后晋任用杨承信为右羽林将军，杨承祚为右骁卫将军(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十三《晋书第九》)，获准回家服丧。不久，朝廷任命杨承信为平卢军节度使，继承父亲的职位。

后晋少帝耻于向契丹称臣，契丹遂南侵。后晋北平王、河东节度使刘知远，在后晋与契丹(辽)争战之际，持观望态度，致使后晋被灭。他在天福十二年(947年)六月十五日自立称帝，改国号为汉，次年改元乾祐，史称“后汉”。仕汉期间，杨承信由青州节度使改任安州节度使及鄆州节度使，累加检校太师。

后汉乾祐三年(950年)十一月，枢密使、鄆都留守郭威不满后汉隐帝的骄纵与肆杀，以清君侧为名，发兵南下，被拥立为帝。次年正月五日，在开封建都，国号周，建元广顺，史称“后周”。杨承信摇身成为后周的大臣，“广顺初，加同平章事。诸将西讨刘崇，承信表预行。以郊祀恩加开府阶，封杞国公。”后周太祖郭威死后，养子柴荣即位，是为世宗。杨承信被封为韩国公，随世宗征伐淮南，担任濠州攻城副都部署，改任寿州北寨都部署兼知行府事。

饮马淮河，“征淮南”，下“南唐”，一路拼杀。

南唐的创立者徐知诰，复其本姓李，改名昇。原国号齐，后改为唐，史称“南唐”。

取下蔡是克南唐寿州(今寿县)的重要一环。后周显德二年(955年)十二月，南唐下蔡县令李中被俘，软禁于下蔡城，写下《登下蔡县楼》一诗：“长淮烟水又含秋，吏散时时独上楼。信断兰台乡国远，依稀有王桀在荆州。”

显德三年(956年)八月，南唐军欲毁下蔡浮梁，“以舟实薪刍，乘风纵火”，被击退。九月，“以左卫上将军杨承信为右羽林统军”(《旧五代史》卷一百十六《周书第七》)，杨承信与赵赞等“将轻骑断吴人饷路”。所谓的“吴人”，源自南唐的军队。据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，显德四年(957年)三月二十一日，“帝大陈甲兵受降于寿春城”；二十三日，“徙寿州治下蔡”。

平定南唐寿州，杨承信有战功，被提升为忠正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后周移寿州治所于下蔡。由下蔡县的治所，提升为忠正军和寿州的治所，扩建城池，时不我待。作为忠正军节度使、寿州刺史的杨承信及时抽调人力物力，在淮水三弯处进行“扩容”。新建的寿州城，嘉庆《凤台县志》称之为“下蔡故城”，据萧景云《下蔡故城遗址考》云：“南北东西距各二里余，周可八里”。

稳定，是军管的首要任务。伴随南唐军队的溃败，淮河流域主要由后周控制，却不时受到“准人”的袭扰。《宋史·杨承信传》说“遣监军薛友柔败准人六百余于庐州北”，所说的“准人”，来自哪里？

“准人”，在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《宋史》中不乏记载。最早是指唐末杨行密以淮南节度使割据一方、建国“吴”所

在的军队。“吴”被南唐替代，后周的势力抵达淮城后，这个“准人”当属南唐在淮城的残余势力。

周恭帝继位，杨承信被封为鲁国公。

赵匡胤陈桥兵变，改后周为宋。《宋史·杨承信传》载，“宋初，加兼侍中，来朝，会征李筠，命为泽州西面都部署，筠平，移镇河中。”李筠叛乱发生在建隆元年四月。六月一日宋太祖赵匡胤至泽州督战。杨承信跟随赵匡胤征伐叛将李筠，被任命为泽州西路都部署。

平定李筠之乱，杨承信不再重返忠正军。建隆元年八月初九日，由“忠正节度使兼侍中”改任护国节度使，驻守河中(今山西永济市)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，“承信至河中，或言谋反。上遣作坊副使魏丕赐承信生辰礼物，因察之。还言：承信无反状。承信因是获释于镇。”以虚无的谋反罪名，测试杨承信的忠诚度。当时以太原为都城的“北汉”，投靠辽朝，继续与宋为敌。“河中”，是战略重镇，并非一线防线核心。杨承信的境遇，恰如河中之所在，耐人寻味。

建隆二年七月的一天，宋太祖赵匡胤问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赵普：“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，战斗不息，生民涂炭，其何故也？”这种疑问，不仅是对“五代十国”成因的追问，也包含着对杨承信等镇守一方的节度使的试探与提防。

乾德元年(963年)，杨承信被封为赵国公。二年(964年)卒，年仅四十四岁，赠中书令。至死守护河中地区的安宁，无愧于护国节度使之名。

忠于朝廷，杨承信“屡历藩镇，刻励为政，有遗爱”，后世有人出，景德四年(1007年)，录其孙杨松为“奉职”。熙宁二年(1069年)，录其曾孙杨立田为“三班借职”。这是后话，大体也可看出其“时”与“势”的把握和“处变”的定力。